



七至八世纪 赴日唐人研究

葛继勇 著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

浙江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规划项目

中日文化交流新视域丛书

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研究

葛继勇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研究 / 葛继勇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中日文化交流新视域丛书)

ISBN 978 - 7 - 100 - 11688 - 6

I. ①七… II. ①葛… III. ①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
—研究—唐代 IV. ①D8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0839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日文化交流新视域丛书)

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研究

葛继勇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1688 - 6

2015年12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5/8

定价: 50.00 元

七至八世紀吐蕃人研究

葛綏成著

总 序

在通常的学科分类目录中，“中日文化交流史”一般归入“专门史”门类，但其本质应当属于交叉学科，不仅其外延覆盖中国史和日本史，其内涵还涉及思想、宗教、法制、民俗乃至文学、艺术、社会、经济等人文社科的方方面面。

尽管作为一门学科地位尚不甚稳定，然而“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相关研究，国内外均有深厚的积淀。总体上说，日本起步较早，成果也颇丰硕；中国急起直追，点面均有突破。

日本方面的代表性成果，首推辻善之助的《增订海外交通史话》与木宫泰彦的《日华文化交流史》，虽都成书于半个多世纪以前，但依然不失为经典，尤其木宫泰彦的著作经胡锡年汉译，成为众多中国学者案头必备之书；其次是森克己围绕“日宋贸易”的系列作品，即《日宋贸易之研究》、《续日宋贸易之研究》、《续续日宋贸易之研究》、《日宋文化交流之诸问题》，以网罗史料齐全见长；再则是田中健夫，成果集中于元明时代，如《对外关系与文化交流》、《中世对外关系史》等，继承森克己学脉而多有创新。除此之外，实藤惠秀的中国留日学生、大庭修的中日书籍交流、池田温的中日法制交流、

小曾户洋与真田柳的中日医学交流等研究，均有开拓之功。近十余年来，更呈群贤辈出之势，如森公章、山内晋次、榎本涉、河野贵美子等，各有建树，令人刮目。

回观中国，在民国时期的抗战硝烟中，虽偶有吉光片羽的佳篇力作，如王辑五的《中国日本交通史》等，但基调一直比较低迷；新中国成立后，硝烟已散，敌意未消，此门更趋凋零。迨及 20 世纪 70 年代，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研究才渐成气候。

由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交叉学科特性，涉足该领域的学者也颇庞杂，除了日本学专家，专治国学各科专家也参与其中，依托各自学科领域的深厚功底，急起直追，以致短时间内后来居上，在局部点面屡出新意。

如在文学领域，严绍璦《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与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堪称珠联璧合，开创中日文学交流史新生面；在考古分野，王仲殊围绕“三角缘神兽镜”撰文著书，提出“东渡吴人制镜说”，震撼东瀛；于人物专题，韩昇《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沈殿忠等《中日交流史中的华侨》，拉近了与日本学界的距离；哲学思想方面，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日中儒学之比较》不拘旧说，创意间出；书籍交流方面，严绍璦《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王勇等《中日“书籍之路”研究》等，文献学与历史学相结合，尤其架构“书籍之路”理论备受关注；古代史有汪向荣《古代的中国与日本》、王金林《奈良文化与唐文化》等，均有日文版问世；近代史有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严安生《日本留学精神史》等，颇得学界好评。此外，在港台地区，郑梁生的明代中日关系史研究、高明士的隋唐东亚教育圈研究、谭汝谦的中日书籍互译研究等，均独树一帜，不可忽视。

如上所述,“中日文化交流史”涉及中日两国历史文化,日本虽然起步较早,但论者多依据本国文献史料、立足于本国历史文化、拘囿于传统史学观念,所以涉及日本大抵考证精当,事关中国或多语焉不详。中国的情况则稍有不同,主要有两点:涉足此门的学者基本上精通日语,又能读懂艰涩的日本古代汉文史料,语言优势为其一;在吸收日本学界成果的基础上,发掘中国文献中的相关史料,对传统的学说或观点加以佐证或修正,继而提出新见解,史料优势乃其二。

正因为上述原因,中国学界虽起步较晚,但近数十年来进步神速,在某些点甚至面,呈现后来居上之势。前述许多学者的著作在日本出版发行,以及王仲殊获“福冈亚洲文化赏”、严绍璁获“山片蟠桃赏”、王晓平获“奈良万叶世界赏”、严安生获“大佛次郎赏”等日本重要学术奖项,说明该领域的中日学者,已经进入平等切磋的新阶段。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周一良、严绍璁、王勇联袂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10卷本问世,该丛书由中日双方各20余位知名学者执笔,同时在日本发行日文版,该丛书荣膺“亚太出版商联合会”学术类图书金奖,堪称中日学者联手营造这块学术园地的结晶。

本丛书聚焦于“中日文化交流史”,既顺应上述国内外学术界的大趋势,也反映出各位作者归属的学术团队的小背景,在这里有必要作个交代,以助读者了解每部作品的来龙去脉。

在日本研究渐趋兴盛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本人在杭州大学创建了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在“专门史”学科点招收“中日文

化交流史”方向硕士研究生；1998年该中心随“四校合并”而改称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遂在“中国古代史”学科点招收“中日文化交流史”方向博士生；2004年本人因故调离浙江大学，8名博士生最后挂靠在“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完成学业。

1989年创建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之际，我把研究重点定位在“以书籍为纽带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并以开放模式运作科研项目，广邀国内外同道合作攻关。这些成果大多汇入《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中日汉籍交流史论》、《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奈良平安时期的日中交流——以书籍之路为视点》、《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诸书，先后在国内外出版。

我在浙江大学培养的8名中日博士生，虽然各自的专攻年代不同、侧重的领域相异，但一个共同特点是注重文献史料。回忆陈年往事，每周举办“读书会”的情景历历在目。桌子上堆满各类字典及参考文献，然后一字一句注释中日文献的相关史料，这些虽然看似枯燥乏味，但因此打下比较坚实的文献学基础。看到日后这批学生从“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毕业，当年的辛劳也不再觉得苦涩。

自从2000年招收第一位博士生，算来时光已经流逝了10个春秋，现在他（她）们大多晋升为副教授或教授，在国内外高校独当一面。虽天各一方，但学脉相承，学术上的交流愈趋频繁，擘画这套丛书可谓水到渠成。然以“新视域”括之，我想大概以下几条可作依据。

首先，本丛书纵向由隋唐及宋元再至明清，每个朝代均有专著，上下衔接，自成体系；横向则涵盖历史、宗教、文化、教育、贸易诸分野，展现文化交流之丰富多姿。

其次，作者均精通日语，对日本学者的成果细心咀嚼，经过吸

收与扬弃，依托国学底蕴、立足中国史观，敢于提出新观点、新思路、新见识。因此，这些著作即使放到日本学界，相信也不会逊色。

再则，作者都接受过比较系统的文献学训练，对书中引用的大量中日古代汉文史料，不仅在断句、训字、释词诸方面用力颇勤，在文意的诠释、史料背景的推断上也有创见。

还有，整套丛书虽聚焦于“中日”，但作者视野多兼及东亚，在东亚文化互动的大背景下，审视追踪中日文化交流的历程。从传统的文化双向交流研究，进化到区域文化环流研究，符合国际学术界的发展趋势。

最后，各卷作者均有在日本长期留学或执教的经历，受到中日两国学术氛围的熏陶；而且，他们在攻读博士期间，辗转于“历史学”和“文献学”两个学科，以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双重的学科背景来研究这个跨学科的主题，相信会有独到的发现。

本套丛书初拟八卷，即隋唐两卷、宋代两卷、元代一卷、明代一卷、清代两卷，虽然总体上由隋唐而明清，似乎串接成一部中日文化交流通史，然元明时代略显单薄；加之各卷的主题也未能一以贯之，如隋唐部分偏重于书籍与人物，宋元明部分围绕佛教，清代则以教育和贸易为主。我们这个团队酝酿已久的一个计划，便是合作撰写断代的中日文化交流通史，届时或可弥补本丛书留下的缺憾。

这套丛书若能给读者传递“新视域”的些许愉悦，给“中日文化交流史”领域吹入几丝新鲜气息，则所愿也。

王 勇

2010年11月30日

序 一

高明士

两岸史学界对日本古代史或古代中日关系史，乃至东亚古代史研究极少关心，因而研究成果寡少。主要原因之一，除“二战”后严峻的政治环境以及语文不易克服外，更重要的是日文研究成果，包含学术研究期刊及考古报告等信息取得不易，图书馆藏书亦甚为贫乏。二十世纪末以来，学术研究环境大获改善，优秀研究人才辈出，作者即是在名师王勇教授培育下的战后第二代新秀。我与作者素昧平生，近来读作者寄给我的在日本重要学术刊物发表的百济人《祢军墓志》相关日本记事若干论文，非常钦佩作者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现在作者要出版博士论文，畏友王勇教授推荐我撰写此序，不免惶恐，乃略志数语，以策来兹。

本书在“绪论”之外，共分为三篇，第一篇讨论“唐人”用语的内涵以及唐人记事的成立，第二篇是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总论，第三篇为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个案研究，文末附录有八，制作图表，殊为难得。其论述内容，能够广搜日本学界研究成果，兼及木简金石文，在华人学术界中的确少见。书中不因陈说，勇于提出己见，

颇有创意。论述方式，是以专题研究深入探讨，能够发人未发之覆，随处有精辟见解，实为不可多得之佳作。

本书论述的时段，设定在七八世纪之际，这个阶段，可说是东亚史上的大纪年。政治秩序方面，“东亚世界”在此时形成；文化交流史上，也出现所谓“东亚文化圈”（或谓“中国文化圈”）。东亚在地理上，指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越南。在世界史上，西方在此时渐入黑暗时期，而东方则呈现光辉灿烂的一页。

东亚世界的政治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而展开的，目的在建立册封与朝贡体制，简称为封贡关系。这是因为当时中国有其先进的文化与优势的實力，后者（實力）特指兵与刑。文化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总体表现。当异文化相互交流后，劣势文化必然要摄取先进文化，以求改善现状的生活，于是出现文化变容。就东亚地区而言，诸国在摄取先进的中华文化以后，在当地生根发展，也成为当地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主要的成分。归纳而言，诚如日本西嶋定生先生（已故）所指出，有如下诸项：汉字、儒教、律令法制、中国化佛教，笔者再增列一项：中华文化中的科学与技术（简称科技），共有五项。这五个中华文化中的基本要素，呈现在“东亚世界”，就是在七八世纪之际，成为“东亚世界”文化发展的共通要素，所以又称为“东亚文化圈”，有异于世界其他地区出现的文化圈，诸如印度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等。

东亚文化圈所赖以成立的五要素，其实都是以汉字文献作为媒介，所以又可称为“汉字文化圈”。就汉字本身而言，它是语言工具的代表，包括文字、书法及书籍文献等；儒教指以儒家基本经典，如五经，乃至依据儒家理论而撰成的文史著作等，以作为个人行为准则及建国君民的方针；中国化的佛教，指以汉译大藏经作为基本

经典，以及中国式的佛寺建筑与艺术等；科技特指由政府设学传授或官方师徒相传的医学、天文、历法、算学、乐舞及阴阳学等。据此可知这五要素已包含文化最重要的质素，如语言工具、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所以能够长期存续不坠。近代以前，东亚世界的政治秩序常随着中国国力的盛衰而有变形的发展，朝鲜半岛、日本乃至越南也会学中国的天下秩序原理而另建“小中华”；文化圈则不然，是始终存在的，这是因为中华文化在这一时期始终能够保持优势，而文化圈存在的推动力，又在于各国主动摄取中国先进文明以及推展当地公、私教育事业，因此能够使文化圈的共通要素在各地生根成长，变成各该地人民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受中国政局变动的影响。

本书的论述多次提到东亚世界及文化圈，虽然东亚世界的政治秩序以及文化圈诸要素并非该书主题所在，但从诸专题的论述看来，正含有这些课题，实为东亚世界形成史上的有机结构发展提出有力的佐证。

例如就汉字文化而言，本书第一篇首先以《日本书纪》、《续日本纪》等古典文献所载的“唐人”用语为中心，从该用语的时代性、地域性以及广泛性等方面，对内涵极为复杂的“唐人”用语进行了全面的限定。第二篇第五章探讨了汉音汉字教育，包括大学寮及佛寺教学，就大学寮的教学而言，由音博士司掌此事，并于第三篇详考唐倭续守言、薛弘恪二人被任命为音博士，推动吴音转向汉音。二人亦曾参与编撰《净御原令》，而薛弘恪又参与编撰《大宝律令》。根据作者的考证，《续日本纪》所见的“萨弘恪”、“萨妙观”以及“萨仲业”中的“萨”应该为“薛”，这是一个重要发现。就史籍所载，继薛、续二人之后出任音博士的，为唐人袁晋卿。袁氏擅长音

韵，接受吉备真备等人的招请赴日，不仅“职践州牧”，任职地方政府长官，而且还作为音博士、大学头，以及作为外交机构玄蕃寮的长官玄蕃头，为日本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招请袁晋卿等唐人来充实日本礼制之举，也可视为吉备真备致力于唐风文化移植的一环。

佛教方面，遣唐使招聘的唐人不仅有文人，而且还有僧侣。八世纪中叶，鉴真赴日就是日本方面的招请与慧思信仰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篇第三章详细讨论此事，并于第五章再论鉴真僧团赴日，除整備奈良佛教界的戒律外，还携去天台宗、华严宗等佛教宗派的经典以及建筑、美术、工艺、书法、医学等盛唐文化。

奈良时代的赴日唐人多因拥有一定的技能而被邀请搭乘遣唐使船只前往日本，如八世纪中叶，皇甫东朝、李元瓌、袁晋卿、皇甫升女等，因在舍利法会上演奏唐乐，被授予从五位下。皇甫东朝的音乐才能似乎最为出类拔萃，所以被任命为雅乐员外助。现存于奈良正仓院的“金银平文琴”，被推定为八世纪前半叶。其琴表饰有图案，图中皇甫东朝旁有两人在演奏琴和阮咸，音乐之声招来鸟蝶，连仙人都慕皇甫东朝之名而至。该琴背还刻有东汉李尤（126年始任乐安相）的《琴铭》：“琴之在音，荡涤耶心。虽有正性，其感亦深。存雅却郑，浮侈是禁。条畅和正，乐而不淫。”这是一种典型的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另从琴表所饰图案看来，其中还蕴涵着一种神仙思想。该乐器上表现出的这种音乐美学思想会与吉备真备所献的乐制理论著作一样，对日本音乐理论和美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皇甫东朝等唐人可能就是携带此琴赴日的人选。这个论点，值得注意。

在文化交流中，媒介人物是摄取文化的主要动力。尤其遣唐使团的使节人员、留学生与学问僧等，除直接到唐朝学习外，其所携

回的文物，丝绸、乐器等物质层面的和宗教、艺术等精神层面的大唐文化，大大提升日本古代文化的内涵。

更重要的是，遣唐使还带回了可以直接传播这些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唐人。另一方面，赴日的不同阶层的唐人，在与异国人交往、共同活动乃至通婚的过程中，无疑地会更进一步地推动唐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另一方面，本书还探讨了赴日的唐朝使节，《日本书纪》称为“唐国使人”或“唐客”。八世纪之前，赴日的只有唐使和被被百济俘虏的唐军下级士兵。唐使有高表仁、郭务悰、刘德高、司马法聪、李守真，除使高表仁之外，赴日的唐使均未见于中国史籍。事实上，来唐的日本使节也未见于中国史籍。作者对赴日唐使事迹作若干考证。八世纪赴日唐使有两批，其一是沈惟岳等人，其次是赵宝英等人。赵宝英等人遇到海难，只有孙兴进、秦愬期等人抵达日本。整体看来，总人数当超过40人。本书第三篇第三章详细解析沈惟岳等人赴日的活动，第二篇第四章第三节则探讨孙兴进及其宾礼的接待。在讨论接待孙兴进礼仪时，作者指出日本有着双重的“中华”思想，即对新罗和渤海，以中华帝国自居；对大唐帝国，则以朝贡藩国的身分存在，所以实际是日本天皇依“藩国之仪”，“遂降御座”，北面使者行拜见之礼，这是重要的提示。在我看来，《续日本纪》在这一节避谈“藩国之仪”，反而记载孙兴进等朝见天皇时，其仪节是“上唐朝书，并贡信物”，而天皇以“诏”书答礼，实有伪作之嫌。这个例子，说明小国面对大国而常有两面外交，尤其在面对国人时，要呈现其独立自主，不只日本如此，同时代的朝鲜诸国，乃至独立后的越南也是如此，甚至可说古今中外皆然，这是论史时格外要留意的地方，也就是治史者对史料的运用，持批态度是必需的。

最后，借日本奈良时代具有实权者皇族长屋王(684?—729)的一句话来与读者共勉，其语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长屋王因推崇佛法，曾制千件袈裟赠给大唐佛教界，同时邀请在扬州大明寺的鉴真大和尚到日本弘法。当时在袈裟边缘上绣此四句，正面上虽说是与异域的中国佛弟子结缘，以示佛法无边，但由此四句汉文，也可反映出日本与中国是“风月同天”。从本书的课题看来，也就是一个历史世界、一个文化圈的历史现象，能不惜缘乎？鉴真终于破除万难赴日，为日本佛教界作出重大贡献，此事作者有详论，读者可参看。

是为序。

序 二

新川登龟男

本书作者葛继勇是以提出“书籍之路”而扬名海内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的泰斗——王勇教授的得意门生。

很早以前在与王勇教授交往的过程中，我已对葛继勇有所耳闻。在其作为访问学者来到早稻田大学之后，我才得以真正地接触到他。

葛继勇于2010年被选为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公派访问学者，于次年（2011年）至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后自2012年11月起，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博士后研究员），在本人研究室继续开展相关学术研究项目。该研究项目是由日本学术振兴会为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外籍学者提供科研经费，资助为期两年的在日研究。葛继勇能够获得这些研究项目资助，无疑与他本人卓越的研究能力以及各方对其寄予的殷切厚望有莫大关系。

葛继勇在日期间研究课题是“古代日本对唐佛教文化的受容和排斥”。具体来说就是探究鉴真及其弟子等赴日唐僧以及遣唐留学僧为日本带来了何种佛教文化，以及这些文化是如何在受容与排斥的过程中植根于日本文化等系列问题研究。

其对随鉴真赴日的唐僧法进的著作《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的研究颇为引人注目。此前，这部著作并未引起学界过多关注，但是从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知晓中日佛教文化、礼仪习俗的差异以及法进所具有的儒释两家的教养学识等。葛继勇正是着眼于这一点，在对《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诸写本进行收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缜密的校正、比较，旨在整理出更为精准的文本。并以此深化对《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中所载的中日佛教文化差异的比较研究，以期进一步明确鉴真弟子法进的著作在日本是如何被解读的。他的这种研究是建立在史料实证主义基础之上的一种更高层次的挑战，我们期待他的研究成果早日问世！

另外，在此期间，以早稻田大学重点领域研究机构——东亚佛教文明研究所为平台，我们开展了由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经费资助的“从文明的推动者——佛教来看东亚的差异和共存研究”（负责人为新川登龟男）的项目研究。

葛继勇的研究课题与该研究项目有重合之处，他也参加定期举行的研究会，并参与了我们实施的中国天龙山石窟学术调查，为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研究成果，将于近期公布。

在王勇教授的辛勤栽培下，葛继勇的研究能力、学术能力、日语表达能力在访日期间日益精进，甚至有了质的飞跃和提高。与此同时，他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宽。其对于新发现的弥军墓志中的“日本”一词，有着精辟独到的见解，该研究成果被许多日本著名期刊刊登，引起各方关注。另外，他在文学方面亦颇有造诣，对在日本影响力极大的白居易及其诗文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他也对入唐求法巡礼僧圆仁相关的中国新出土的石刻资料进行了探讨。另外，他在早稻田大学也参与了朝鲜史研究及日本平安时代史